

文庫博物館專集（三十三）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一九九八年四月六日出版)

[illegible]

本期目录 (zk9804a)

- | | | |
|----------|--------------------------|-----|
| 1.【史海钩沉】 | 追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五·一六通知》起草内幕 | 叶永烈 |
| 2.【自由论坛】 |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 王若水 |
| 3.【广阔天地】 | 插队诗抄之六 | 邢 奇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方式最好是电子邮件，其次是寄来软盘，再次是字迹清晰的打印件或手稿。CND邮址：CND, P. O. Box 10111, Gaithersburg, MD 20898-0111, U. S. A. 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谢谢！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请勿在营利性出版物上转载。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史海钩沉】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追溯文化大革命的根源

——《五·一六通知》起草内幕

• 叶永烈 •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场大灾大难。对于文革的结束的日子，众口一词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因为在这一天晚上，拘捕了“四人帮”，从此结束了那场浩劫。

◇《通知》是发动文革的标志

至于文革从何日算起，则有三种见解：

一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因为这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大批判宏文”揭开了“文革”大幕。毛泽东曾说，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开始的；

二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因为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人称《五·一六通知》。这一《通知》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三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因为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文革“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在这三种意见中，第二种意见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认同：因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只能视为文革的前奏曲，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发表则意味着文革在全国开展起来。介于两者中间的《五·一六通知》，则是向中共全党发出开展文革的号召，提出了文革的政治纲领，所以文革应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乃文革开始之时。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到五月二十六日才结束。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当时在杭州，没有出席这一会议。然而毛泽东遥控着会议。会议的一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

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以“中发（六六）二六七号文件”向全党下达。同时，在《通知》之后，附了所谓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其实《五·一六通知》是针对《二月提纲》而写的，而《二月提纲》却又是针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来“不正常的学术批评”而写的。所以，要弄清《五·一六通知》的来龙去脉，必须从《二月提纲》说起……

◇南北两个“五人会议”唱对台戏

自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后，中国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南一北，两个“五人会议”唱起了对台戏：

二月二日起，在上海锦江宾馆里，“女客人”江青召开“五人座谈会”，即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来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名义。这个“座谈会”，实际上是江青一人谈，别人听而已。后来，江青的“一人谈”被整理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全党。

二月三日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讨论起草另一文件的也是五个人！他们是彭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五人小组是六四年五、六月间，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列席五人组会议的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王力。

这个五人小组针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一场大风波进行了讨论，由许立群、姚溱加以整理，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的主要内容分六个方面，针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

其中第四点特别强调，“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些话不指名地批评了姚文元及其同夥，后来康生“声明”，他是反对《二月提纲》的——尽管他也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上保持“沉默”。

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彭真又作了一些修改，于二月七日用电报把《二月提纲》发给正在武汉的毛泽东，二月八日，彭真、康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二月十一日，彭真在武汉代中共中央拟了关于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

二月十二日清晨，彭真所拟批语电传到北京。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后表示同意，并把《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印发文件之际，觉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只称“五人小组”。

◇ “电话记录”成把柄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动向，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以“有事”为理由，中断了上海的“座谈会”。得知毛泽东已经从武汉来到了杭州，便赶到那里向毛泽东探听消息。

三月上旬，正当江青忙于修改《纪要》时，在北京爆发了“电话事件”。

那是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去北京。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阀是谁。

杨永直在三月十一日返上海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覆。那是许立群记下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报告。对话的记录如下，颇为微妙：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央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覆，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了张春桥。张春桥听罢，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加快了《纪要》的定稿进度，她要以《纪要》跟《二月提纲》相抗衡。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向毛泽东密报了“电话事件”，那个原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的康生，精于权术，见风使舵，此时反戈，攻彭真，批《二月提纲》。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和康生作了两次谈话。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作了谈话。

毛泽东这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说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 毛泽东号召“造反”

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彭真就三月十一日的“电话事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

就在毛泽东谈话之后，四月一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跟康生谈话之后，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飞回北京

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谈话。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只有一句话：“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很不满意，毛泽东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有讲为什么撤消，应当重新起草。”

毛泽东还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毛泽东的话否定了那份“技术性的”《通知》。毛泽东找“理论家”陈伯达，要他另行起草《通知》，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只是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

陈伯达找了“快笔头”王力合作。由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写出初稿。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钓鱼台开会讨论陈伯达、王力起草的《通知》，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

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修改后的《通知》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仍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这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这样，中共中央的两位“大秀才”一起出马；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康、陈起草《通知》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作准备。各大区的书记也去开会。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毛泽东提议，起草小组到上海去起草《通知》。

于是，起草小组的成员们纷纷前往上海，聚集在上海锦江宾馆后楼，名义上说是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陈伯达、康生这两位“大秀才”要在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此起草小组的实际领导权便落在了留在上海的江青手中。

刚刚完成了《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

这时，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也第一次在起草中央文件中显示了重要作用；起草小组写完第一稿，即由张春桥派人急送杭州。毛泽东看后加了一些话，派人即送张春桥，由他转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又进行了讨论、修改，再由张春桥派人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了一些话退张春桥……王力笑称张春桥为“秘书长”。只是张春桥的那位“亲密战友”姚文元，此时还被撂在锦江宾馆外，还够不上“中央级”的“秀才”的资格。

如此上海——杭州穿梭，足见毛泽东对《通知》的重视。

当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和康生从杭州赶回上海，出席会议。据王立回忆，这两位“大秀才”看了《通知》，“在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会议开到了一半，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上海，又加了一些话。电话是王力接的。王力听不清楚，让吴冷西接，一边接，一边记下毛泽东的话，添入《通知》中。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知》起草完毕，由康生带到

北京。《通知》不敢叫中共中央办公厅排印，怕那里会“泄密”。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长谢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厂去排印。

◇彭真突然消失

云密风紧，中国政治气氛日益紧张。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见不到彭真的身影！

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分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因为二十八年不准她介入政局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莫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反反复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

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是“新星”张春桥，五月六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的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种种“问题”。

◇打“三家村”，邓拓遭难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怨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鞑伐。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

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

三家村”》。与半年前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同的是，翌日全国各报刊（包括各省报）都转载了《评“三家村”》。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

《五·一六通知》共分三部份：

一是前言，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撤销《二月提纲》，提出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

二是批判《二月提纲》，指出“十大罪状”；

三是结束语。

《五·一六通知》的结束语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及邓小平，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毛泽东所加的话“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们自己。

本来，那时把文革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也有的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个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怪胎：中央文革小组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撤消原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后来成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份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吴冷西被删去。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经江青提议，增加张春桥为副组长。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位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告诉笔者，是江青提议增加姚文元。

组长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江青不悦道：“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说请示过主席，于是，姚文元“忝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元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这个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在四个副组长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员与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其实，江青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中央文革说一不二的组长。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有一句话：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这样中央文革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康生之前。据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对笔者说：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的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十四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引者注：指王力、陈伯达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的那个地方）。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一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横扫“牛鬼蛇神”，全国一片哀号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象开了锅；五月十七日夜，邓拓自杀。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彘、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个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的革命中究竟干甚么？》。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

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这时，毛泽东仍坐镇杭州。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对吴冷西极为不满意。五月三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不得不给毛泽东发去请示信：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信当日就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当天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

一架专机急急从北京直飞杭州。从飞机上走下来康生和陈伯达，两位“大秀才”给毛泽东带来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专机又急急从杭州飞到回北京。

五月三十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基本精神捅了出去，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样，《人民日报》把文革之火点燃起来，北京一片混乱。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六月一日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摇头。他“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邓无奈，随即又飞回北京。

北京城头乱纷纷，毛泽东在杭州笃笃定定。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

◇江青成为“老四”

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她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分，在北京高等院校四处发表讲话，煽风点火。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四十摄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〇一医院。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

力已大大膨胀：机构膨胀，权力膨胀。“代理组长”江青已成为“实权组长”。

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就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

□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5月号 （小雨输入）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 王若水 •

文化大革命结束二十年了。在文革的十年中，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惊心动魄的事件真可谓波谲云诡，令人眼花缭乱。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仍觉得扑朔迷离，有许多不解之谜。

大家知道，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一个使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毛泽东本人的说法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说法为以后的官方所采纳。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在犯文革这样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种说法为相当多的人接受。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还应该问：毛泽东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人们可以说：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新事物缺乏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错误更是难免。这也是官方的说法。

但是文革不是普通的错误；它错得那样荒唐，那样离谱，使人难以理解。绝不能说这样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换了别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的任何一个）处在毛泽东的位置，虽然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不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却是可以断言的。其实，这并不需要特别的英明，只要有普通人具有的健全的常识就够了。那么，以毛泽东这样本来有高度智慧和敏锐判断力的人物，为什么犯这种悖于常理的错误？仅用“缺乏经验”这一条是说不通的；缺乏经验，为何不谨慎一些呢？对此，《决议》说，毛泽东变得不谨慎了，骄傲了。骄傲是事实，但是毛泽东的骄傲为什么要用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呢？骄傲是一种心态，除此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心理因素呢？

◇ 从来拿不出复辟的证据

我们不妨再想一想：毛泽东口口声声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他真的

相信危险有那么严重吗？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从来没有拿出过有力的证据。在理论上，毛泽东不止一次重复列宁的这些言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资产阶级的力量仍比无产阶级强大，而资产阶级的反抗则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时时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为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列宁的这些话是针对十月革命初期的俄国说的，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况而照搬到中国。在六十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毛泽东没有理由害怕资本主义复辟。他早在一九四九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那时都不怕，为什么在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被消减以后反而怕起来了呢？

其实，在文革中，毛泽东并没有花什么力气来对付社会上过去的资本家，这些人只要红卫兵一动就跪下了；毛泽东真正用全力对付的是党内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即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那么，“党内资产阶级”是些什么人？毛泽东为什么说他们搞“资产阶级复辟”？

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是指一些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他认为这些人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毛泽东多次表现出他对官僚主义的厌恶，也多次警告过干部腐化变质的危险。他说党内有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他把“四清”运动中农村一些干部的多吃多占、贪污浪费行为说成是“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毛泽东这话使人相信，他是为了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保持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而发动文革的。

这个理论是经不起深究的。照毛的说法，似乎干部的道德败坏就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这样的干部就要千方百计地复辟资本主义。但第一，贪污腐化并不是只有资产阶级专有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一直就有。第二，贪污腐化分子只不过是牟取个人利益，并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雄心壮志。

在文革中，确有许多干部由于官僚主义和腐化而受到批判，可是这并不是文革中大批判的重点。作为头号批判对象的刘少奇既不是官僚主义者，也不是腐化变质分子。此外，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刘少奇是忠诚的共产党人，对这一点毛泽东其实很清楚。

然而从一开始，毛泽东就蓄意把他打倒。早在一九六六的《五·一六通知》中，毛就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赫鲁晓夫”指谁？是泛指还是具体有所指？一九六七年《红旗》第五期发表的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解开了这个谜。文章斥责刘少奇说：“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

以戚本禹的身份，是说不出这个话来的。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阅过，这只能是毛泽东的意思。李志绥的书证实了这一点，他回忆说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开群众大会，刘少奇做自我批评，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隐身在幕后的毛泽东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四五五页）

毛泽东凭什么说刘少奇是“反革命”？有证据吗？没有。

毛泽东对准刘少奇的第一炮是他写的《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攻击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措辞激烈，言语严厉，帽子极大，可实际上没有多少内容。刘少奇当时不过是提出派工作组和转发一个关于制止乱打乱斗的文件而已。派工作组本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可是毛泽东却不认帐了，让刘少奇和邓小平承担全部责任。毛泽东还硬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关于这个问题，中共一本代表官方观点的书说：“刘少奇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他的工作都是在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都是对党和毛泽东公开的，他的重要论著在发表以前都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至于党中央对干部的任免，也不是由刘少奇个人而是由党的领导集体讨论决定的。他在言论中和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凡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过的，他并没有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三七八页）这一点，毛泽东自己难道不清楚？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说？只有一个解释：这是蓄意罗织罪状。

一九六七年，又硬说刘少奇赞扬过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没有证据表明刘那么说过，即使说过又算得了什么问题？）而大张挞伐。毛泽东还亲自出来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这本书在延安时期被列为学习材料，那时毛泽东是肯定的；现在却说这本书是“欺人之谈”。毛对这本书的主要指责是其中没有谈“无产阶级专政”，这似乎就说明刘就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就说明刘是“修正主义者”。所有这些批判尽管是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但无论从党纪和国法上都是不足以给刘少奇定罪的。最后，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当刘少奇已病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作出决定，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这样，刘少奇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都完了。尽管这个决定和处理都是在批判刘少奇两年之后，可是在此之前谁都能料到，刘少奇必然是这样的结局。毛泽东已经把事做绝了，他没有后退的余地，置刘少奇于死地是既定方针，“叛徒、内奸、工贼”这样的罪名，不过是使这样的处理合法化罢了。因此，刘少奇专案组使用的诬陷、罗织以及逼供等手段是毫不奇怪的。

总之，上面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泽东如此仇恨刘少奇，一定另有原因。

#### ◇斯大林问题和毛的态度

文革的发生是突然的，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念头却酝酿已久，要了解事情的原委和背景，我们必须多费一些篇幅，从五十年代的“斯大林问题”谈起。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逝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领袖。谁来代替他的位置呢？这个人要有长期领导革命斗争的资历和丰功伟绩，要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崇高威望。这样的人本来应当由苏共的领导来充任，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无论是斯大林指定的继承人马

林科夫（他很快就下台了）还是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都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在斯大林死后，世界上活着的共产党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威望能和毛泽东相比。以毛这样的性格，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雄心，这是极为自然的。几十年中，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盛行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享有政治的和理论的绝对权威，现在该轮到毛泽东了。

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斯大林逝世三年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罪行。斯大林问题的揭露，是一个轩然大波，震惊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善良的普通人。

如果中共抓住这个机会，认真地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自我批评，那么后来重犯斯大林的错误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中共准备这样做吗？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显得很冷静。这种冷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的表现吗，还是另有原因呢？

对于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应当感到满意。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他比斯大林高明。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不是很好。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支持王明，苏联政府支持蒋介石，毛泽东对此是心存芥蒂的。过去不能批判斯大林，现在可以了，可以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了。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也是证明毛泽东的正确，比斯大林高明。

但是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后来，在一九五八年的成都会议上，他又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惧的是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

实际上，赫鲁晓夫并没有全部否认斯大林的功绩，也没有彻底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然而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却妨碍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要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这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所“忧”。

毛也不会不想到，“肃反”的错误，他自己也不是没有犯过。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毛在赣西南搞肃清“AB团”的运动，杀害了一大批无辜的革命者。这个大冤案一直没有平反。

这就难怪当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和善良的普通人为斯大林的残暴行为感到震惊的时候，毛泽东却批判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这就是说，毛泽东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揭露得太多了，批判得过分了。

现在，斯大林已经不再是毛的阻碍，赫鲁晓夫也没有被毛看在眼里，可是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却妨碍了毛泽东。他正想取代斯大林，享有那种世界性的万人膜拜的威风，尽管那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在中国流行，可是和苏联对斯大林的崇拜相比，在程度上和规模上却是瞠乎其后的。

毛泽东要保护自己，就要保护斯大林；他要为自己树立斯大林在世时享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就要想办法为“个人崇拜”翻案。

在开始时，毛泽东迫于形势，不能不说几句赞成反对个人崇拜的话；后来他就一步一步改变腔调了。

中共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第一个公开反应，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文章表示了对苏共的支持，说：“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一论》中强调对斯大林不能否定得太多：“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同年，中共中央举行八大，也对苏共批判个人崇拜予以肯定和表示支持，但不是很热烈。

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没有提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只是在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中提出。这显然是要把个人迷信问题放在一个较为次要的地位。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在成都会议上讲话，开始为个人崇拜局部翻案了：

“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一九六三年六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列举了两党之间的一系列原则分歧。其中一条是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说：“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不久，《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编辑部在联名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九评”中的第二篇）中，又把公开信中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论点发挥了一通。这就把反对个人迷信全部否定了。

把这些言论同中共中央在一九五六年时所表示的态度相比，可以看出变化之大。一九五六年是赞扬苏共对个人迷信的批判，虽然毛泽东后来表示了一些保留，那也不过是觉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在具体做法上太过分了，“一棍子打死”。现在却

是从原则上反对批判个人迷信了。但是，拿出来的理论根据却是根本站不住的。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斯大林只是不满，对赫鲁晓夫则是痛恨，原先只是说赫鲁晓夫不应该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现在却要一棍子打死赫鲁晓夫了。毛泽东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批判个人崇拜，因为他需要别人崇拜他。

到一九七一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斯诺问到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说到文革前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不听他的话。“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搞一点崇拜。”

到这里，毛才算是吐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不过他的理由是站不住的。他夸大了别人对他的不服从，以便为自己要求别人崇拜找到籍口。

#### ◇大跃进：毛超过苏联的尝试

毛具备了一切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条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无法与苏联相比。

毛下决心向苏联挑战，使中国赶上苏联。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时说：

“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扛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利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毛选》五卷三四四—三四五页）

毛说苏联的钢、煤、石油都“不算数”，其实自己心里是很嫉妒的。如果是自己的，那就算数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当时，赫鲁晓夫正处于国际共运分崩离析的困境，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毛泽东及时的给予了支持，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但如此，毛还提出，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



赫鲁晓夫表示谦虚，说：“应该以中苏两家为首。”

毛泽东显得很有自知之明：“我们没有资格……”

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不赞成“以苏联为首”的提法，说：“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平等的么。”

毛泽东努力说服他：“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吧，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们谁能代替苏联这个角色？当然，为首不是为尊，不能一家说了算，讨论问题必须是平等的。比如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不同意，没有先例么！”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九日与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会面时，重复了这个思想：“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需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

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苏联准备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说：“你们再加把劲，能不能用十年的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上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只能说：“我们努力，还是可能的。”

毛泽东说：“你们用十年的时间超过美国，我们十五年超过英国。”

这个豪言壮语赢得了会场上的掌声。

然而毛的雄心比他宣布的还要大。早在前一年（一九五六）的八月，他就说要在五六十年中超过美国：“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是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选》五卷二九六页）

现在毛鼓励苏联超过美国，难道他满足于超过英国？不。那么他只要赶上美国吗？也不。毛的真正对手是苏联。他要比苏联更快地赶上美国，他要比苏联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

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要以中国为首了，而他也就是世界共运的领袖了。

毛泽东在莫斯科谈话的意思是两点，第一，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第二，这个头必须是苏联。如果，事实最终证明苏联当不了这个头，怎么办呢？赫鲁晓夫既缺乏杰出的领袖才能和理论修养，也不享有斯大林曾经享有的崇高威望。如果苏联在经济建设上再落后于中国，它还能是头吗？

毛深谙《老子》的策略：“将欲废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现在不是时候，毛泽东在等待这一天。苏联会发现，这个头是不好当的。当然，苏共习惯于当“老子党”，不过，毛也想争夺这个“为首”的地位。

这次，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挑战，只是意味深长的伏笔。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是学苏联，虽然有成绩，但没有自己的创造。现在，毛泽东要亲自挂帅了，要走自己的路了。既然是他来挂帅，当然要一鸣惊人，超过老大哥。

毛的雄心可以从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看出来。当时毛泽东的精神显然是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他破例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六次讲话，反复讲后来居上，年轻人超过老年人（注意：苏联是老大哥）的思想。他从中外历史上列举了一大堆杰出人物的名字（贾宜、王弼、孔夫子、达尔文、马克思、列宁、李政道、杨振宁等等），说明他们都是年轻时崭露头角，敢于创立新学派，向老古董开战。他批评有些人精神不振，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站惯了，不敢坐。他讲了一件事情：中国画家画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一起的像，把毛泽东画得比斯大林矮一些（实际情况相反，毛泽东身高要高一些）。这件事显然使毛泽东耿耿于怀。他评论说，这是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好象塑菩萨，总是比人大好几倍，为了吓人。

在两个月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把他讲话的题目定为《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这个意思就更进一步了。毛说，马克思也是人。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马克思没有干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这样革命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

毛泽东的潜台词是很清楚的：马克思都可以超过，苏联还在话下吗？

毛泽东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

这就是毛泽东发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背景。

毛泽东的这个雄心，赫鲁晓夫也感觉到了。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毛的目的很明确：他想如果他能够在五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最后的遗言》第十一章）

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大跃进的失败已经明摆着时，毛泽东还在武昌会议上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要搞得快一些，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面前，我设想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到多少钢”。“总之，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实际我们先进入，怎么办？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

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按博士的头衔，但并不妨碍他们的博士之实。”

#### ◇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的阴影

不难想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多么丢了中国的脸。国际上传为笑柄，赫鲁晓夫也在一九五九年初的苏共二十一大作了不点名的批评。毛泽东本来想显示，从他抓经济后，形势顿然改观，和别人完全不同，证明他的反对反冒进是对的。

不料，大跃进搞糟了。从此毛有块心病（obsession）——赫鲁晓夫的影子。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要来算这一笔帐？斯大林在世时也是一个神，赫鲁晓夫一个秘密报告，他就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受到全世界的指责和唾骂，这件事一定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同样的命运会不会轮到他自己头上呢？中国党内会不会有人学赫鲁晓夫的榜样？这样的人可能是谁呢？

一九五九年，我听了康生的一个讲话，其中有一段话使我震惊，一直忘不了。大意是：过去都说斯大林的错误是肃反扩大化，现在看来，斯大林肃反还不彻底；比如，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就没有挖掘出来。这是斯大林最大的错误！康生讲这几句话时，声色俱厉，脸都涨红了。

我相信这也是毛的意思，至于发明权属于谁，并不重要。对毛重要的是，他一定要在他活着的时候找出党内可能的赫鲁晓夫。

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这个会议本来是要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但毛泽东既要纠正自己的错误（这种纠正是很有限的），又十分讨厌别人出来说三道四。偏偏性情耿直的彭德怀在这时多嘴，上万言书，形势陡然改观。尽管彭德怀字斟句酌，措辞温和，表明自己完全出于善意，但还是触痛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他能够猜想到，党内外对大跃进都会有意见，只是有敢说不敢说的区别；知识分子经过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已经噤若寒蝉了，但党内的高级干部会不会有人出来批评他呢？现在果然跳出来一个彭德怀。毛泽东从彭德怀的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才作秘密报告的，彭德怀却在毛泽东健在时就“发难”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上书的反应是迅速而坚定的：他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从“纠左”转为“反右倾”。“纠左”是和风细雨的，因为那实际上牵涉到自己；“反右倾”却是暴风骤雨，因为他认为彭德怀是对自己“下战书”。“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里通外国”“分裂党”……这顶顶大帽子往彭德怀头上扣了下来。特别是“里通外国”，好像说彭德怀和苏联有秘密的组织联系，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此外，毛在张闻天的信中，劈头一句就是：“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但既然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有根据的，于是大家也就跟着这个调子批起来了。但不管怎么逼迫，“里通外国”和“军事俱乐部”始终查不出任何证据。事情很清楚，这是毛泽东蓄意诬蔑。

许多人弄不清，为什么毛泽东要对彭德怀如此心狠手辣。历史上的宿怨（毛泽

东是记仇的)？还是彭德怀的“犯上”(毛对自己的权威是很敏感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毛从彭德怀的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

在小组会上，很多人都说彭德怀是魏延，有反骨。七月三十一日，常委会上，毛还对彭德怀说：“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彭德怀不喜欢个人迷信，不喜欢毛主席这个称呼，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也是批判的重点。

然而这一个时期，国内经济形势却十分严峻。一方面，“反右倾”给左的势头火上添油。另一方面，由于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和苏共的争端上，国内的工作放松了。主要是政策上的错误，加上气候条件和苏联的停止援助，出现了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在这期间，饿死的灾民以千万计，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饥荒死亡的人数。这无论如何不能证明毛泽东的正确，反而使人感到“反右倾”是反错了。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中央不能不改变左的政策。一九六一年初，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七千人大会：察觉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九六二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他在讲话中也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他不再提出在二十或十五年间超英赶美，而说，“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在这个会上，刘少奇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有一个正式书面报告。在对这个报告做口头说明时，他讲得稍稍坦率一些，说：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方，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四四九页）。还说：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些。迟几年办是可以的。”刘少奇还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说彭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

刘少奇没有意识到，这些话对他是致命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是毛常说的话，刘却公然表示不同意；刘说主要是人祸，这人祸是谁造成的呢？刘表现出对彭德怀的同情，其矛头所指更是昭然若揭了。更重要的是，这些话说明刘对“三面红旗”其实是不赞成的；他现在不便说，却说要到五年十年之后再来总结经验，这不是要等毛死后来算帐吗？毛正在探查潜在的赫鲁晓夫，现在这个赫鲁晓夫已经露

出苗头出来了！

实际上，毛在“七千人大会”号召大家讲话不过是“引蛇出洞”的故技。他肯定从刘少奇的讲话中嗅到了某种危险。不过他当时什么也没说。

有一个人看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并且马上抓住机会加以迎合来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人就是林彪。早在一九五九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林彪就以毛泽东权威的衷心维护者的面目出现。。他声色俱厉地斥责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在这次会议后，林彪就在军内发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他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在毛泽东的处境再次不利的时候，在别人都在谈论工作中的缺点的时候，林彪却出来唱赞歌。大讲了一通成绩如何大，缺点如何小，成绩要归功于“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而困难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受到了干扰。林彪的发言结束后，毛泽东带头鼓掌。毛泽东还对罗瑞卿夸奖林彪的讲话水平如何高，说“你就讲不出来”。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看清了党内的形势：刘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怀的，是对“三面红旗”有所保留的；林彪是维护毛泽东的，是“紧跟”和“高举”的。我们可以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时开始想到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比刘少奇更合适，毛已经从刘少奇的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影子。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他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这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在这里，已经埋下了用林彪换掉刘少奇的伏线了。从文字上看起来，毛泽东说的是下一代的问题，实际上，他是认为老一代也有问题。两年后，毛泽东和胡志明谈话，说，“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四八九页）这意思就很明白。

主要由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李富春等人对“八字方针”的贯彻，到一九六二年下半年，经济已经明显好转了。毛觉得，他着手反攻的时机到了。

◇为报复找理论依据

到这年的七月和八月，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开始算帐了。他把一些正确的意见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他认为彭德怀向中央递交的申请书（彭在六二年六月写了八万字的长信，要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搬出“阶级斗争”的口号来，无非是要给自己整政治上的对手找藉口，找理论

根据。

从这以后，毛泽东不断给阶级斗争加温，他同时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作战。一九六三年五月，他主持指定了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文件，其中说，“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同年六月，中共中央发表给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当年九月到次年七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连续发表了九篇批判苏共中央的重头文章（俗称《九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写了有关文艺的第一个批示，提出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问题。随后文艺界开始整风，并对一些文艺作品开展批判，这个批判迅速扩大到整个学术界（如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批判）。最终，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纲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这时的林彪异常活跃。他善于对毛泽东察言观色，并千方百计加以迎合。在文革刚刚开始发动的时候，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在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长篇发言中，说出了毛泽东最喜欢听的话：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所经过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的讲话震动了整个会场，这就是有名的“五·一八”讲话。这个讲话经中共中央批示同意，转发到全国，事先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应该感到满意，现在终于有人公开说他超过马克思了。特别是林彪讲到“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那几句话，真是把毛的心思摸透了。

文革不仅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有密切联系，也和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有密切联系。江青在文革中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受了一肚子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这话确实泄露了毛泽东的满腹心思。庐山会议后的七年，“七千人大会”后的四年，毛泽东开始报复了。

纯粹从认识上的“失误”来说明文革，例如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错误地理解了“修正主义”，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种理解方法假定，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一个理性的行动，是受他的理论指导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动机有很

大的心理的、情绪的因素，有不少非理性的成分。

#### ◇夸大修正主义危险

如果我们按照字典上的解释来理解毛泽东使用的一些词汇，就不明白毛何以那样担心“修正主义”，何以如此夸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六十年代的中国，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通过心理分析来解读这些符号的隐秘含义，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所谓“修正主义”，在字典上的含义是指出现在共产主义内部的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张，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毛本人也这样解释过“修正主义”，所以他并不是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但是，毛泽东把要求纠正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错误的意见称为“翻案风”，又把“翻案风”当做“修正主义”来批判。这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什么关系呢？在文革中，“修正主义”一词的实际用法发展到指对毛泽东的任何一句话（包括错误的话）的不同意见。这就隐含着一个意思：毛泽东的任何一句话都代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都是不能修正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休想效法赫鲁晓夫来批判毛泽东了。“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也是这样，按照字典上的解释，它是指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按照这样解释，也不会懂得毛泽东为什么会那样害怕“资本主义复辟”，为什么要指责彭德怀和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刘少奇和彭德怀等人被打倒，真正的原因并不是毛泽东误认为他们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而是毛泽东怀疑他们有朝一日会来纠正他的错误，对他的“三面红旗”改弦更张。这一点，毛泽东并没有估计错。但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却是有意夸大。刘少奇尽管认为毛泽东有错误，但是不可能在毛泽东身后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那样的方式来对待毛泽东。有可能的是他采取一种温和的方式来有限地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例如改变人民公社的体制），他也可能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表示过去中央的工作有不恰当之处。即使这样，也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

所以，支配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行动的，主要并不是他们的理论认识，而是他的情绪和性格。甚至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过是给这种动机穿上一件合理化的外衣而已。毛泽东需要夸大“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有这样才能把全党全民动员起来以维护他的权威并打倒刘少奇。并不是毛泽东先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发动文革；相反，毛泽东是先要搞文革，然后发明出一套理论，来使这个行动合法化、合理化。也不是毛泽东误以为刘少奇要搞资本主义，因此才要打倒他；而是毛泽东由于不可告人的原因要打倒刘少奇，因此才给他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如果说刘少奇要象赫鲁晓夫那样搞“修正主义”（这里暂时假定赫鲁晓夫搞的是修正主义），那是错了；但如果说刘少奇将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效法赫鲁晓夫来修正毛泽东的某些错误，那是很可能的。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看对了，并没有什么“失误”。

以上是我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的看法。当然，这里只涉及毛的主观动机。文革并非什么人想发动就可以发动的，还需要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客观条件。我们还需要回答“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文革”的问题。不过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需要另文探讨了。

□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六年十月号 （熊毅植字）

~~~~~  
【广阔天地】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插队诗抄之六

• 邢 奇 •

〔作者前言：“……诗作大部份是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时写的，我从1967年11月至1976年3月在锡盟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曾改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插队，除了短时期的伐木、打草、打石头之外纯是放牧，开始时放了一小段牛，后来一直在放羊。”（插队诗抄之五载于z k 9 8 0 1 b——编者）〕

黄狗（一）

生人骑马来远方，黄狗一见，马上就汪汪。
人到近前更发狂，追出领地，尾巴又高扬。

黄狗不仅会汪汪，也会呜呜，那是来了狼。
蹲踞在地下颚扬，呜呜报警，神色甚紧张。

黄狗不仅会高吼，也会低吼，那是来了狗。
唇颊耸动鼻梁皱，恫吓对方，样子实在丑。

黄狗（二）

黄狗跟我真不错，我骑马，它跟著。
跑出几里身发热，没有汗腺，只好吐出舌。

黄狗跟我真不错，外出集会，摘鞍它守卧。
蜷起身子缩成团，眯起眼睛，觑著生人过。

黄狗（三）

黄狗平时还沉著，护食时，如疯魔。
颈毛蓬起象掸子，按住骨头，众狗不敢夺。

一条小狗，偏来罗嗦，黄狗虽横，却也没辙。
小狗从来受优待，狗界也有狗德。

老狗

老狗倦眼难睁，堪称龙钟。
毛长夏未脱绒，一副丑容。
搬家时，众狗随车，前呼后拥。

独有它，走不动，安卧车中。

为何享此殊荣？

主人答道：“这条狗，颇有功。
二十年来，护羊群，勤恳忠诚。
如今老了，理应该，得到善终。”

春风把包掀翻

春风把包掀翻，主人一看傻眼。
黄狗前天刚分娩，顿成丧家之犬。

衔崽忽然搬迁，山后知青，有包不太远。
牧场知青是一家，居然连狗，也懂这一点。

刚把锅盖一掀

刚把锅盖一掀，气味使人流涎。
黄狗卧于羊粪盘，闻香立刻来前。

使劲摇尾乞怜，尾上羊粪沾连。
纷纷洒洒落一锅，晚饭这下全完。

正要饱餐一顿

正要饱餐一顿，有狗前来扒门。
手掷牛粪还真准，狗中鼻梁便滚。

门又响，不用问，狗是吃认打不认。
不料门开是客人，无端受此一粪。

春季掏狼窝

山好陡，牵马走，此山中，狼可有？
汗马归家莫空手。
明知行路难，偏走难行路。
狼黠巢何在？草高石乱处。

秋日围狼

月落星明近五更，去出征。
朦胧一队影匆匆，马蹄轻。
散开列阵成环形，口不封。
远山还在有无中，闻喊声。

忽然处处起伏兵，壮视听。
手执长杆争先锋，齐夹攻。
今日仇敌狭路逢，眼分明。
马跑快如刮地风，豺狼惊。
霎时手起套不空，看神功。
结队凯歌放高声，群山应。

冬日打狼

帽子追飞不肯休，套狼催马风嗖嗖。
驮著死狼迎众去，耳疼流泪雄纠纠。

□ phlxl@gauss.bwh.harvard.edu 推荐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国）	< cnd-cm@cnd.org >
本期 校对：	钟 超（美国）	< cm-ee@cnd.org >
读者技术咨询：	徐名扬（澳大利亚）	< cnd-help@cnd.org >
网络技术维护：	李健民（澳大利亚）	< cnd-info@cnd.org >
	周皓生（加拿大）	< cnd-info@cnd.org >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国）	< cnd-cord@cnd.org >
《CND》总编：	熊 波（美国）	< cnd-manager@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GB 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 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或 [canada.cnd.org](f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